

场看,理论尽管源于实践,但却是不能还原为实践的。因此,理论之进入实践便不能是直接的,即理论智慧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实践意识或实践智慧。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理论只能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进入实践,理论对于实践不是构成性的,而只能是导向性的。

理论对于实践之非构成性,即便对于最为发展的理论形态即现代科学,也是如此。这种情况表现在科学理论之转化为实践的工业设计中。科学定律一般而言是一种精确的函数关系,但其应用于工程技术之中时,并不试图对工程中的一切细节加以理论描述以便使科学理论完全地通达工程之实际,因为这是无法做到的,而是往往根据经验采取一种增加保险系数的方式。例如,在材料工程中,根据某种强度理论,可计算出某种零件需要若干数量的直径或厚度,但实际工程设计中却并不是采用这一计算出来的数值,而是要通过增加一个保险系数而使得这一数值大大增加。而且,要增加的保险系数,在不同的执行者那里也往往是各不相同的。至少在不同国家中关于保险系数的技术规范是不同的,甚至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和行业中,亦不相同。同理,其他领域中的理论向实践的转化也是这样的。在这种转化方式中,我们看到,理论对于现实的工程技术规范并不

是刚性的构成性的,而是一种有一定伸缩范围的柔性的导向作用或调节作用。这种非构成性的调节性作用,自然并不限于理论的实用性用途上,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说,在其他领域更是如此。

这种理论智慧对于实践智慧的导向或调节作用,也是一种辩证法,即实践辩证法。如果把理论中的辩证进展视为一种理论逻辑或理论智慧的话,那么,这种实践中将理论作为调节而形成适宜的行动方案过程的实践辩证法便是一种实践逻辑或实践智慧。理论智慧在于尽可能地由抽象向具体进展,以在理论世界内达到更大程度的具体性。而实践智慧在于基于实践世界中行动者处境的极其复杂多样性而将理论接引到现实生活当中来。

前面的考察表明,对于当今的实践哲学范式而言,重要的是在此范式下如何说明以往以理论哲学范式加以说明的事物,而不是追随潮流,仅满足于贴上时髦标签,或满足于望文生义地发感慨。如果实践哲学能够基于自身的理论原则充分地说明理论之意义,则人们便不能以后实践哲学之类基于偏解与误解的说法轻言超越实践哲学。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

生产辩证法与实践哲学的可能路径

崔唯航

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实践哲学的声音一直此起彼伏,若隐若现。不同研究者由于哲学旨趣、问题意识的差异,使实践哲学研究呈现出多种面相。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清理“地基”的工作并未完成。本文试图以现代生产方式所涌现出来的重大时代问题为线

索,反思并探究实践哲学发展的可能路径。

一、实践哲学的范式反思

我国学界关于实践哲学的研究,往往追溯到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问题。如果这一追溯的目的在于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的话,那么无疑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如果着眼于思想的创造的话,那么这种做法就蕴含着一种误入歧途的危险。因为如果不满足于一种表层的相似,而是立足于深层次问题的实质的话,那么就应该注意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和现代实践哲学的根本性差异。换言之,如果不是二者都带有“实践”二字的话,那么它们完全可以被视为不相关的两类问题而分别开来。从解决问题的视角来看,二者的联系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而且可能导致一定的遮蔽作用。这一论断的根据在笔者看来,现代视域中的实践哲学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必然与理论哲学相伴而行的。就像不能离开主体来谈论客体一样,也不能离开理论哲学来谈论实践哲学。而实践哲学和理论哲学作为一种哲学类型或问题进入哲学思想的视域乃是现代的产物。简而言之,从性质上看,实践哲学的问题乃是现代性的产物。只有到了现代社会,实践哲学的问题才得以突显出来并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

对实践哲学的探讨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从最为根本的层面上看,实践哲学及其问题源自现代的生产方式。相对于古代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现代生产方式是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生产的进步不再依赖于生产者经验的积累和技艺的进步,而是源自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科学技术推动下的机器大生产在观念领域中完成了一种抽象化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人被抽象为一个认知的思维主体;自然被剥离为一种“观念的构造物”。于是,“自伽利略起,观念化的自然就开始偷偷地替代前科学的直观的自然了”,“即一种方法论上的观念化功能暗中替代了那种直接的作为在一切观念化那里被当

做前提的现实性而被给予的东西”^①。与这种抽象化活动相伴而生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分立、理论世界与实践世界的分立。对这一分立的哲学关注和反思使实践哲学应运而生。因此,只有到了现代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分立及其问题才得以进入哲学的中心视域。在古代社会,固然会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差异,但它并不构成哲学关注的主导性问题,因此对古代实践智慧的关注除了历史价值之外,很难为思想的创造提供多少有益的启示。就像对古代织布经验的研究并不能对现代纺织工业提供多少帮助一样。换言之,现代纺织大工业和古代的家庭纺织固然都可以制作服装,但对二者的研究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就像资本和地租都可以获得财富,但二者却是两类不同的问题一样。

二、生产辩证法

如果说理论哲学立足于“知”的视域的话,那么实践哲学则立足于“行”的视域。“怎么做”构成了实践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作为思想中的时代,哲学所关心的当然不是个体性的具体行为,而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普遍行为。基于这种考虑,对于最具时代和社会意义的实践活动——社会化生产活动的考察就将进入实践哲学的中心视域。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者或企业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原则,换言之,个体以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为行为准则,个体的生产充满了偶然因素,但令人奇怪的是,个体的偶然并没有导致作为整体的社会的无序,恰恰相反,由这些个体组成的整体——社会却获得了高度发展。这就构成了著名的“蜜蜂的寓言”或“曼德维尔悖论”:私欲的“恶之花”结出的是公共利益的善

^①[德]埃德蒙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38、239页。

果。^①从哲学的视角看,“曼德维尔悖论”实质上是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即个体与整体的相反关系何以可能。按照一般的理解,个体的善导致整体的善,个体的恶导致整体的恶。比如康德的人格理论,将个体的人格放大或扩张,就将得到相应的整体。在此个体和整体直接同一。这一学说在逻辑上非常完备,但问题在于它并不符合现代的社会现实,也无法回应“曼德维尔悖论”所蕴含的哲学挑战:个体与整体的相反关系。亚当·斯密看到了这一问题,并试图借助于“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进一步阐明并解决这一问题。尽管亚当·斯密的理论努力卓有成效,但经济学的研究毕竟不能代替哲学的反思。在哲学上真正面对并试图解决“曼德维尔悖论”问题的乃是黑格尔。

黑格尔之所以对这一问题有所作为,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自己时代的问题以及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②黑格尔所处的时代,现代性的生产方式已经高度发达;在为期七年的耶拿时期,黑格尔对经济学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并自觉将其成果纳入到自己的哲学创造之中。正像卢卡奇所指出的,“他的关注点不在于对经济学自身进行原创性研究,而在于怎样把经济学研究中最先进的成果纳入到关于一般社会问题的科学之中。进一步讲,他致力于发现隐藏在社会问题之中的那些辩证的范畴。”^③

黑格尔所走的乃是一条从个体上升到整体的辩证法之路。在黑格尔看来,个体与整体之

间不是量的大小问题,而是质的差异问题。要跨越这一差异,就不能借助于个体的简单叠加,也不能借助于人格或自我意识的简单扩张,而必须引入一个第三者作为中介,这就是由产品构成的对象世界。作为中介的产品,首先可以被视为作品,作品反映了主体与对象的同一关系,体现了个体的个别性。但是,现代化大生产的特点在于一旦作品被生产出来,它就进入了一个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之中,就不再作为体现个体性的单纯的个别劳动产品而存在,而是作为对象世界的组成部分而存在,黑格尔把这个对象世界命名为事情本身。

从作品到事情本身,蕴含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转变。第一,从孤立主客体之间的对象化关系转向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品作为个体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体现的是主客体之间个体性的对象化关系。因此“能将一个作品与另外的作品进行比较并从而认识到诸个体性自身是不同的个体性。”^④事情本身体现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第二,从个体性转向了普遍性。在事情本身之中,个体与作品之间的对应关系奇迹般地消失了,以至于个体再也无法找到自己的作品,他所面对的乃是“异己的陌生的现实”。“它的这种特定存在既是自我意识的作品,又同样是一种直接的现成的、对自我意识来说是异己的陌生的现实,这种陌生的现实有其独特的存在,并且自我意识在其中认识不出自己。”^⑤既然个体在事情本身之中“认识不出自己”,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无主之物”^⑥,这同时就意味着它是一个“普遍性的东西”,这样,从作品到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从个体上升到普遍、整体的过程。

^①1714年,曼德维尔出版了《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行公共的利益》。他在书中把人类社会比喻为一个蜂巢:“这些昆虫生活于斯,宛如人类,微缩地表演人类的一切行为。”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欺诈、享乐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他们变得善良、正直起来。然而,其结果却是整个蜜蜂王国的衰落,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不再有人订货,全国一片萧条。

^②[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2页。

^③G. Lukacs, *The Young Hegel: Studies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Dialectics and Economic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5, p. 319.

^④[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66页。

^⑤[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8页。

^⑥[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85页。

个体上升到普遍和整体的过程是一个反转的过程。个体的生产行为本来是个别性、偶然性的,但是生产行为的结果——产品却导致了反转,产生了一个必然的、有序的整体——社会。在黑格尔看来,这就是“曼德维尔悖论”所蕴含的个体与整体的相反关系的哲学根源。“于是意识毋宁对它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可解的谜;它的行为的后果,在它看起来竟不是它的行为自身。”^①

个体上升到普遍的过程也是一个颠倒的过程。从一般逻辑来看,作为对象世界的事情自身乃是由个体劳动所生产的作品构成的,因此,作品应当占据优先地位。但社会现实反映的却是作品一旦完成,就已经作为对象世界的一部分而属于事情自身了。在此,发挥主导作用的不再是个别性的作品,而是作为整体的事情自身。“这样一来,事情自身就丧失了它作为宾词的关系以及它作为无生命的抽象普遍性的规定性:它毋宁是为个体性渗透了的实体;它就是主体,在这种主体中个体性既是作为它自己,换句话说作为某个特定的个体,又是作为一切的个体;它就是普遍。”^②,可见,个别性的作品与整体的事情自身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借用熟悉的语言表达就是,事情自身上升为主体的过程就是生产者创造了商品,商品却反过来成为了人的主宰。立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视角,这就是从“自然联系占优势”转向“社会因素占优势”,从“人的依赖性”时代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时代。至此,马克思的声音已经隐约可闻。

三、实践哲学的可能路径

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③,都深深凝结和表征着它的

时代。“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④从这些耳熟能详的论述中,不难看到黑格尔的影子。事实上,在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观点。应该说,对时代问题的关注构成了马克思一生研究工作的基本轨迹。对曼德维尔及其《蜜蜂的寓言》,马克思同样予以了关注,他不仅在相关论述中多次谈到曼德维尔和《蜜蜂的寓言》,而且对其予以了高度评价:“只有曼德维尔才比为资产阶级社会辩护的庸人勇敢得多、诚实得多。”^⑤对“曼德维尔悖论”的解决,马克思则同样站在了黑格尔的肩膀上。

与黑格尔相似的是,马克思同样引入了一个作为第三者的中介,因此其论述方式也是三元结构;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马克思的中介不再是令人费解的事物自身,而是商品世界。从商品出发问题就会变得更为明晰。马克思指出,“用木头做成桌子,木头的形状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了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⑥从个体性的角度看,用木头做成的桌子不过是生产者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了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这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就已经进入了商品世界,不再属于个体的生产者了。对于商品世界的研究,马克思同样运用了辩证法。他明确意识到,“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⑦这一“抽象力”就是经过马克思改造之后的辩证法。“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但他遗留下

①[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43页。

②[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78-27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8页。

《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①事实上,马克思正是通过运用辩证法“这种逻辑”,最终解开了商品之谜及其所蕴含的曼德维尔悖论:隐藏在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问题在于,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是否就意味着马克思历史使命的完成。并非如此,如果可以止步于此,那么马克思哲学岂不就是解释世界的哲学了吗?问题还是从辩证法切入。马克思究竟怎样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呢?在《资本论》第2版的跋中,马克思谈到了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差异。“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②这段论述往往被理解为将黑格尔辩证法从唯心主义之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其唯物主义的基础。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其次才是一个思想家的话,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取向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的话,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马克思曾经把“哲学历书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这一崇高荣誉献给了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的话^③,那么思考问题的路径将有所不同。

毕竟,仅仅用“词句反对词句”是无济于事的,“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

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④所以,必须用现实的方式去反对现存的东西。为此马克思不仅寻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革命的力量,而且为他们指引了革命道路。如果立足于这种理解的话,那么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就“既非费尔巴哈‘头足倒置’意义上的‘翻转’,也非黑格尔对立统一意义上的理性跃迁,而是一种基本视域的转换:即从理性的思维过程转向现实的批判过程;从理论意义上的解释世界转向实践意义上的改变世界。”^⑤由此,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建构路径就将不仅在于思想史意义上的谱系梳理,也不仅在于概念演绎意义上的理论建构,更为重要的是自觉深入到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之中,敏锐捕捉到时代提出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问题,深刻把握到社会形态变迁中的历史逻辑和现实矛盾,唯有如此,实践哲学才能真正实现其实践本位,才不会像青铜器和蒸汽机一样被送入历史的博物馆;也正因为如此,实践哲学才能够在通往历史深处的道路上找到打开现实之门的钥匙,并能够不断走向未来、开创未来,成为报晓人类解放的“高卢雄鸡”。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①《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7页。

⑤崔唯航:《重思“颠倒”之谜——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颠倒”问题看辩证法本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